



论商代中后期的北土经略^{*}

——以北京平谷刘家河墓葬遗存为中心的考察

王坤鹏

摘要:礼制在早期政治统治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刘家河墓葬所出青铜礼器系统可作为判断其与商王国之间是否存在政治统辖关系的关键证据。刘家河铜器群数量多且具组合关系,与商礼器属同一系统,具有礼器功能。墓中所出铁刃铜钺亦具礼器性质,其时王赐地方贵族以钺即赋予其管理地方之职权。刘家河墓主活跃于商代前后期转进之际,商核心区由今郑州—洛阳一线徙至安阳地区,商王国重新规划王畿区并向北扩展,与太行山两侧及燕山南北的族群建立了密切联系,由内至外形成了面、块、点相结合的疆域经略方式。商王国通过刘家河这类据点与北方地区展开了广泛的物质、文化交流。商代后期的燕山南麓地区一直活跃着一批臣属于商的地方贵族。商在燕南地区的政治控制虽在范围及强度上存有变化,但从未缺席。这也为其后周王国在这一地区进行分封奠定了文化、政治与经济基础。

关键词:刘家河墓葬;商代;北土;疆域

中图分类号:K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3-0046-09

关于商王国北方疆域与族群情况,孟世凯、刘桓、宋新潮、宋镇豪、卢连成、王震中、韦心滢、张翠莲等学者均曾作过探讨^①。学者所利用的史料或侧重甲骨刻辞,或侧重田野考古发现,其研究内容则涉及商王国的疆域结构、政治地理、北土范围及商文化的影响区域等方面。相关研究于殷商北土的一般情况已然可以提供一幅大略的图景,不过有关商代中后期王国北土经略的细部情况及特征则未及详述。关于这一问题,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仍能提供若干有价值的信息。本文试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的商周铭文及考古资料,重新解读刘家河墓葬遗存的内涵及特点,并由之进一步论述商代中后期王国经略北土的方式及特点,祈请专家教正。

一、刘家河墓葬所见的青铜礼器系统

1977年8月,北京平谷刘家河村村民在村外取土时发现了一批青铜器。经考古工作者勘查及清理,认为铜器出自一座商代墓葬(M1)。该座墓葬的北部在早年曾遭破坏,清理时墓口已被挖成东西宽3米余、南北长2米余的大坑。工作人员估计该墓葬为南北向,东西宽2.6米,似有二层台。墓葬出土器物包括铜、金、玉、陶器共50余件^[1]。表1列出该墓所出器物及数量。

根据残存遗迹来看,刘家河墓葬墓室面积当在6平方米左右,由墓葬规模及随葬器物推测,其属于商周时期的中等级墓葬^②。关于墓葬

收稿日期:2022-11-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商周时期北方地区出土资料与族群形态整合研究”(22BZS005)。

作者简介:王坤鹏,男,吉林大学中国史学系副教授(吉林长春 130012),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表1 平谷刘家河墓葬出土遗物简表

青铜容器 16	兵器 1	金属装饰品 20		玉、石器 12	其他 1
小方鼎 2、弦纹鼎 1、饗饗纹鼎 2、鬲 1、甗 1、爵 1、罍 1、卣 1、三羊罍 1、饗饗纹甗 1、盃 2、盘 2	铁刃铜钺	铜饰 15	金饰 5	斧 1、柄 1、璜 1、绿松石珠 9	平纹麻布
		人面形饰 5、铜泡 3、蟾蜍形铜泡 4、蛙形铜泡 2、当卢 1	臂钏 2、耳环 1、笄 1、金箔残片 1		

的埋葬时期，学界亦逐渐形成较一致的意见。朱凤瀚指出墓中随葬的小方鼎、饗饗纹圆鼎、鬲、罍、长颈提梁盃等器物的断代大致相当于殷墟铜器分期一期，另青铜甗为殷商始见，卯底爵亦不会早于殷墟一期，故刘家河墓葬埋葬时间约相当于殷墟文化一期^[2]。刘家河墓葬所出的一小部分青铜器例如甗、罍、袋足封顶盃、球形腹长颈提梁卣等体现出二里冈上层二期的器物风格，应该是墓主继承或收集的铜器。杜金鹏则推断其所处时段大致相当于历史上的盘庚时代^{[3]561}。

关于墓主的族属，过去有学者据墓中所出的商文化风格青铜器群而主张墓主当是商人，不过更多学者则倾向认为其非商人，而是属于冀北燕山南麓地区的一支土著族群。我们赞同后一种意见。刘家河墓葬所出的青铜容器大多具有中原商文化特征，同时少部分器物也具有一些地方色彩，例如腹部施以连珠纹的云雷纹方鼎形体较小而制作粗糙，三锥足、盖钮与提梁处有环套接的盃等，在其他商文化遗存中比较少见，学者认为它们可能是当地的仿制品^[4]。随葬品中的金臂钏独见于燕山地区，在卢龙阡各庄、迁安小山东庄、喀左和尚沟、宁城南山根等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均有发现。喇叭口金耳环出土地点亦多见于燕山南麓的商周时期遗存中，均属于燕山地区的土著文化遗存。独特的装饰品往往更能作为族群的身份标志，这类金质装饰品表明了墓主真实的族群认同和审美观念。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刘家河墓葬墓主所代表的应是处于燕山南麓的土著族群，属于分布在燕山南麓的围坊三期文化，并不属于商文化的分布区^③。

关于刘家河墓葬遗存的主要争论在于墓葬所出青铜器群能否反映墓主及其族群与商王国

之间存在着政治统辖关系。过去已有学者指出：“平谷刘家河铜器群的发现，意味着商人势力北进之前锋，在盘庚时代已抵燕山南麓。”^{[3]563}或认为墓主人可能是商代北土的一位方国或诸侯首领，“刘家河墓葬中出土青铜器上反映出的这种密切的商燕关系，与殷墟出土甲骨文中所见到的商燕关系的状况是相一致的”^[5]。近年来学者则对此颇有疑议。蒋刚认为刘家河墓葬所出中原系铜容器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时代差别大，非同时代产物；另一个是组合不具规律性，不与商人重视酒器组合的传统相类，故墓主所属的围坊三期文化围坊类型的居民可能并没有接受中原商人以爵、觚搭配为主的青铜容器组合为表征的礼制信仰，而只是把这些铜器当成奢侈品^[6]。张渭莲、段宏振等亦认为刘家河墓葬中所出青铜礼器与中原地区同类器完全相同，“将这些具有中原特色的青铜礼器置于墓中随葬，只能解释为以围坊三期文化为代表的北方人群对于中原先进文化和先进礼制的一种向往”^{[7]329}。

从墓葬遗存的内涵来看，仅将刘家河礼器群视为奢侈品或认为其只体现了北方族群对中原礼制的某种向往等说法，恐怕失之于简单化。刘家河青铜礼器形成了一定的组合关系，且与商文化铜礼器属同一系统，承担着礼制功能。这批青铜礼器的数量不少，整体上属酒器、食器、水器的组合，而且酒器种类较多，形制上均为比较典型的商器，除了一些粗糙的当地仿制品，多数器物应是由商文化输入的。学者将这批铜器与商器进行比较，其中的圆鼎与安阳三家庄 M3 出土的鼎相似，爵与安阳小屯 M188、刘家庄北 M61 所出青铜爵相似，平底罍与安阳小屯 M331 及河北藁城台西 M14 所出青铜罍相似，卣的形制、纹饰与黄陂盘龙城李家咀 M1 所

出的提梁卣相似,罍与安阳小屯 M232 兽面纹罍相似,甗与安阳小屯 M232、小屯 M188 所出兽面纹甗相似,提梁盃与安阳小屯 M331 所出的卵形三足带流盃相似^④。随葬青铜礼器群中包括一件爵,却无觚与之相配,看上去似乎缺乏像典型商文化那样的爵、觚等量配置的形式,关于这一点,杜金鹏认为:“刘家河墓葬中有盃、卣,有一对盘、五件鼎,是很齐全的组合,不应该缺觚,估计是该墓被破坏时(在挖水塘、栽树时,已挖毁一半),已散失了。”^{[3]562}韦心滢亦指出:“本墓虽未见铜觚(或因遭破坏散佚)与随葬器类较繁多(可能与墓葬等级较高有关)外,其鼎爵罍甗或加水器盘的主要器物组合,是完全符合殷墟文化一期时殷墟墓葬中随葬铜器组合形式的。”^[8]总的来看,不管是从器型、纹饰还是组合来看,这批铜礼器与商文化区所发现的铜礼器并无明显区别,二者在组合与功能上都应属于同一礼制系统。

刘家河铜礼器群数量多且形成一定的组合,恐怕不能仅认作是墓主因战争或其他偶然原因所获并作为奢侈品而随葬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西保德林遮峪的铜器遗存。保德县这批铜器于1971年由当地村民修田时发现,应是出于同一座墓葬。其中铜容器包括2鼎、2甗、1卣、2铃豆,兵器包括带有北方文化风格的铃首剑、管釜斧等,另有车马器、铜泡、铜贝等,此外还有赤金弓形饰、金丝饰品、玉器等若干件^[9]。其中青铜容器主要是鼎、甗,带铃铜豆不见于殷墟,带铃器风格应是当地所创,山西石楼县桃花庄墓葬亦曾出土一件带铃觚^[10]。学者或称之为保德类型第一期,并认为该期随葬品中虽有中原铜器,但不见觚、爵、罍等典型中原礼器,似乎是有何就随葬什么,不成礼制^[11]。与保德林遮峪的铜器相比,刘家河铜器群显然更成系统,其作为礼器的功用也更为突出。

二、刘家河青铜礼器系统所反映的政治统辖关系

众所周知,商、周王国仍处于早期国家时期,其时政治统治的范围及对象并不像秦汉以

后有着较清晰的界定。就目前的研究来看,除了文献记载之外,可以反映其时政治统辖关系的一个重要证据即是田野考古中所发现的青铜礼器系统。这与礼制在早期国家政治统治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有关。礼起于原始社会事神致福的风俗,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礼的祭祀层面的功能仍然得以保留,并逐渐为统治阶层所改造,发展为治理国家的一套规则。此即《礼记·礼运》中所说:“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12]也就是说,在三代国家时期,礼变成了维系社会、政治运转的基本的纲纪与制度。当代史家何炳棣于此论称:“虽然最原始的礼的重心是祭祀的仪节和内中包含的伦理道德成分,但礼是多维度、多层面的,自始即无可避免地多少具有维系稳定政治及社会秩序的功能。随着宗教、部落、部落联盟、‘多方’邦国、夏商周三代王国的演进,这些由小而大的政治单位不得不愈来愈缜密地发展政治组织、社会阶级等分、物质分配制度、习惯法、行为规范、雏形成文法,以及早期零散、后期逐渐系统美化的礼论,以为意识形态体系的重心。”^[13]何炳棣指出礼是早期国家不同政治单位之间加以组织的一项原则,其说法切中肯綮。

判断早期国家中央与地方之间是否存在政治统辖关系,礼器系统应当作为一项关键的指标。三代贵族政治的各种活动诸如朝觐、分封、册命、征伐等均须依礼而行,故礼虽具有多层次的功能,但随着政治组织的扩展与日益复杂化,其在制度层面的功能则发展得最为充分。刘家河青铜器群数量不少且全属礼器,与商文化铜礼器组合并无多大差异,其中一部分器物很可能来自商王廷的赏赐。青铜礼器主要用于礼仪与政治的场合,故这套礼器可以用来说明墓主所在的政治组织与商王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政治联系。学界之所以于此多有分歧,主要原因在于或隐或显地将考古学文化、墓主族属与政治统辖关系三种不同层面的内涵混淆为一体,有时则不言自明地默认非商人族属必不受商王国的政治统辖。实则此前提并不成

立,商王国已远非一族一邦形式的小国家,而是拥有广土众民的广域型国家,其国内的族属成分已然比较复杂,族属与政治统辖关系之间并不必然是一致的。

从遗物简表(表1)可以看出,刘家河墓葬所出的这批铜礼器堪称墓葬随葬品的大宗,一方面起着标示墓主人身份的作用,这些来自商王国中心区的青铜彝器通过赏赐、赠予或交换流向地方政治体,在其原来所承担的礼制功能之外还可能起着威信物的功能,成为地方政治体首领标示身份、获得政治合法性的一类物品。即使是当地所仿制的铜器,其技术也是来自与商王朝的交流,同样能体现地方首领所拥有的威望及权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层面,刘家河青铜礼器群包括酒器、食器、水器在内的类别与组合,与商文化礼器系统大体上一致,反映了这批器物与商器相同,本质上仍属于礼器。其中的一些器物不排除是商王册命赏赐之物,其使用场合也应包括与商王廷之间的聘使往还。作为礼器,在墓主活着时,出现或使用于各种日常的礼仪场合。在墓主死后,作为随葬品亦主要是为了标示墓主生前在商王国政治体系中所具有的身份与地位。因此,该墓以与商文化同一系统的大量礼器作为主要随葬品,足以反映墓主与商王廷之间应当存在着某种隶属关系。该处地方首领虽非商族之人,但仍认同并遵行商王国的礼制,其政治权力的终极来源当是位于安阳一带的商王廷。

学者或据刘家河墓葬所属的考古学文化不同于商文化,故认为尽管刘家河商代墓葬出土了大量中原商式青铜器,但只是反映了特定时期内和商王朝的联系,它应属于和商朝相对立的北方阵容,至少大部分时间是这样^[14]。这一观点似仍可再作探讨。至少从刘家河墓葬遗存中,我们看到的证据更多地反映了其与商王朝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显非敌对阵营。刘家河墓葬随葬品中缺乏兵器,说明战争在其社会生活中并不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也就难以说明墓主与商王国之间属敌对关系。与刘家河墓葬适成对比的是晋陕高原上的保德类型青铜器群,相关遗存中兵器占据了大宗。例如山西柳

林高红发现的一批随葬铜器,时代在殷墟晚期至西周前期^[15],其中包括铜盔、铜矛、铃首剑、管銎斧、銎内钺、双环首刀等武器或工具,而鲜见青铜容器^[16]。高红的遗物反映了战争在其族群的日常活动中有着比较突出的地位,这与刘家河墓葬遗存形成了鲜明对比。另高红的銎内钺纯属北方草原风格,与刘家河的直内钺在装柄方式上亦有明显差异。近年考古学者在高红遗址又发现了一批夯土基址,其地颇似存在一处古城址^⑤。从文化遗存内涵来看,高红遗存代表的应是一支与商王国敌对的政治与军事势力。

刘家河墓葬中所随葬的陨铁刃铜钺一定程度上亦能指示墓主的政治身份。这件钺与其说是兵器,莫如说是地方首领政治权力及军事权力的象征,实质上亦具有礼器的性质与功能,反映了墓主与商王廷之间的隶属关系。与刘家河所出相类似的陨铁刃铜钺还见于藁城台西商代遗址 M112。该墓在调查时已遭毁坏,据目睹者介绍,墓葬为东西向土坑竖穴墓,墓内出土物共 26 件,铜器除钺外还有鼎、罍、觚、甗、刀、匕、矛、戈及铜泡,另外还随葬有石磬一类的乐器及玉璇玑等,显示墓主是地方上的高等级贵族^[17]。刘家河墓葬的规模与台西 M112 相似,其随葬铜器种类甚至要超过该墓,则其墓主地位与台西墓主相似或稍高于彼。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一批铜器,传出于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其中亦有一件陨铁刃铜钺,其上饰变体虎面纹^[18],形制与以上两件略似,从形制及纹饰判断,其时代属中商时期,与刘家河、台西亦是一致的,其出现在周初卫国墓地中,可能是周灭商后“分器”的结果^[19]。

据文献所记,某些特定形制的钺在商周时期主要用于一些重大的政治与军事礼仪场合。《逸周书·克殷解》记载周武王克殷,进入商都,举行了一系列的礼仪活动:

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面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悬诸大白。乃适二女之所。乃既缢。王

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悬诸小白。^{[20] 346-348}

黄钺指黄色的大钺,或认为以黄金为饰;玄钺指黑色的大钺,或认为玄钺用铁制成^{[20] 346, 348}。武王在克殷之后进入商王的居所,此时商王纣已自焚而亡,武王仍射三下,以剑击其面,又用黄钺斩其首,悬于白色大旗;商王二妃亦已缢死,武王同样射三下,以剑击之,并用玄钺斩其首,悬于白色小旗。古代的学者或囿于儒家观念,认为此段记载不实,吊民伐罪的周武王必不会如此残暴。实则周武王此举是在执行一种军礼,恰合于早期社会的礼俗。当代史家赵光贤于此认为:“这是从初民社会的野蛮人在战胜敌人之后遗留下来的习俗,一方面为战胜敌人表示欢欣和庆贺,同时又是对于敌人的示威。到了进入文明阶段,国家成立,就变为军礼。”^[21]杨宽先生亦指出这个记载与《墨子》《战国策》等书相合,“当时军礼,斩得敌国首领的首级要悬挂在军旗之上示众,举行献俘礼时,也还要挂在军旗上示众”^[22]。这类看法很有道理。

上引《逸周书》该段内容有脱简,《史记·周本纪》所引《克殷解》还包括周武王除道修社、接受天命等相关礼仪内容。其云:“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既入,立于社南……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23] 162}在克殷之后,周武王在商社举行接受天命的大礼,周公、毕公等所把持的大钺与小钺也是作为礼器用于此礼仪场合。

文献及铜器铭文均记载商周时期的王对族邦首领有赐钺之举,象征着王将治理地方的权力赋予贵族。上述贵族墓葬中所出的钺可能即出自商王的赏赐,是地方首领拥有征伐及专杀权的象征。《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王纣赏赐作为周邦首领的周文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23] 152}商王对周邦首领的这种赏赐实质上是一种巩固统属关系的政治行为,正是通过赏赐“弓矢斧钺”及相关礼仪活动,周邦作为商王国属邦的政治地位得以再次确认,殷、周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得到巩固。一直到西周

时期,赏赐“弓矢斧钺”仍然是王对地方首领进行授权的一种程序。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盘铭云:“王赐乘马,是用佐王,赐用弓,彤矢其央,赐用钺,用政蛮方。”^{[24] 5481}或将“用政蛮方”释为“用征蛮方”,其实“政”作原字读亦可通。周王将钺赐予虢季家族的子白,实即赋予其统治管理地方土著(即“蛮方”)的权力。这种“赐钺”的行为本质上是王对下级职事及权责的一种认定。

三、刘家河墓葬遗存与商代中后期的北土经略

刘家河墓葬的主人活跃于商代前期向后期转进之际。此一时期,商的王都迁至今河南安阳地区,与太行山两侧及燕山南北的土著族群的关系愈加密切,刘家河墓葬遗存的形成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刘家河墓葬遗存所表现出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这一时期商王国与地方族邦势力之间的政治统属关系,另一方面也可由此略窥商王国中后期北土经营的若干细节。

商代前、后期之际,即学者所划分出的中商文化时期^[25],商王国的中心都邑自郑州—洛阳一线向太行山东麓的洹河两岸迁徙。在此之前,商文化的北界虽然已推进至唐河与易水之间^[26],但实际上今河北地区的商文化遗址的分布并不密集。例如经多次发掘的河北邢台葛家庄遗址,其文化遗存基本上属于先商、中商和晚商时期,唯独缺少二里冈时期的文化遗存^⑥。洹河流域作为晚商的首都所在,该地区在下七垣文化时期以及郑州二里冈期商文化白家庄阶段以前的商代时期,并未发现大规模的邑聚^[27]。作为商文化在北方扩展的重要支点的藁城台西遗址,虽然在二里冈上层早段已经出现,但其主要发展期还是在早商末段至殷墟一期^{[7] 133-135}。此后,商人在豫北冀南地区开始建起超大型聚落。例如以邢台东先贤为代表的一批遗存,密集分布于邢台市区至市区西南的七里河两岸,组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遗址群。其规模仅次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等商代都邑,遗

址沿河分布的特点也与安阳殷墟商代都邑的分布格局相似,故学者认为其形成可能与商王祖乙居邢有关^[28]。又例如安阳洹北商城的建设,洹北商城由大城、宫城和小城三部分组成,面积4.7平方公里,已发掘多处宫殿、夯土基址及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该处很可能也是中商时期的一处王都^⑦。学者认为,郑州商城失去都邑地位之后,小双桥都邑对人群和资源的整合并没有维持多久,一部分精英北上至洹北商城所在地再次进行人群和资源的整合,力图在祖先故地寻求新的生存和发展方式^[29]。

伴随商代统治重心的北徙,太行山东麓今豫北冀南地区成为商王国的王畿区,在更偏北的燕山南麓地区则出现了一些政治上臣属于商王国的据点,主要应是当地的土著族邦,刘家河墓葬正是这类据点所留下的文化遗存。学者认为商代后期商所控制的范围表现为“面”“块”“点”的结合,王畿区是一个由商属地与附属国族形成的最大的聚居区,是以“面”的状态存在的,外服区则以商属地与附属国族联合对抗附近的敌族,形成一个个可称为“块”的商人势力圈^[30]。刘家河墓葬主应即是附属国族中的一位贵族,其臣属于商,可能也是与附近的商人势力相联合,形成一个块状的隶属于商王国的势力圈。

商王国通过刘家河这类据点与北方地区展开广泛的物质与文化交流。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东南及辽宁西部地区多个地点发现了商文化风格的青铜器,一部分器物时代属商代前后期之交,例如在赤峰翁牛特旗头牌子出土的一件甗与两件鼎^[31],在辽宁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出土的一件甗^[32],在赤峰松山区西牛波罗乡出土的一件甗^[33],在辽宁喀左小波汰沟出土的一件鼎以及在辽宁朝阳地区征集到的一件弦纹鼎等^[34]。学者曾敏锐地指出,河北中部的藁城台西遗址与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以及赤峰等地发现的铜器群分布在一条直线上^[35]。上述发现于燕山以北的青铜器表明,自大兴安岭南端至商王都之间存在一条绵长的交流线路,刘家河遗址正是商王国与北方地区进行交流的一处重要的中转站。

刘家河墓葬大致形成于公元前14世纪,在

此之后,在安阳殷墟开始大量出现马车、俯身葬、兽首刀等来自北方草原的文化因素,显示北方地区的文化与人群逐渐进入了商都地区。学者指出刘家河及台西等地所发现的陨铁刃铜钺,“出现的时间、地理位置、简洁平素的造型,以及铜铁双金属嵌铸技术,共同显示它们很可能出自北方匠作传统,并通过高地社会的交流网络进入商王朝的北方重镇”^[36]。此外,商王国势力向北方深入,还可能有一个重要目的即获得当地的铜、锡等矿产资源。内蒙古东南部与辽西地区有铜矿等矿产,并且在晚商时期已经加以开采,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即是当时的一处铜矿开采遗址^[37]。学者论称喜鹊沟遗址出产的矿料至少应有一部分是向商王朝或其他具备铸造大型青铜器能力的方国输出,大量的铜、锡资源可以通过贸易或贡赋等途径从矿产富集地区的土著群体手中流入到商文化的中心区^[38]。

在刘家河墓葬之后的整个商代后期,在今天燕山南麓京津唐地区一直活跃着一批臣服于商的贵族,这些贵族多以“亚”为称。辽宁喀左北洞沟青铜器窖藏中包括一件晚商铜甗,其铭文作:“父丁。孤竹亚𠂔。”^{[24]5169}“𠂔”为商周族氏名号,殷墟前期的甲骨卜辞中有“𠂔伯”^[39],西周时期的史墙盘铭文中“逖逖、𠂔”^{[24]5485}等。“亚”有次一级的含义,“亚𠂔”应是𠂔氏的一个分支,在铭文中作为器主的族氏标识。“亚”在商王朝亦是一类职官,不过铭文中的“亚”应是以官名族^[40]。该甗是亚𠂔族的某人为其父名丁者所作。类似铭文还见于一件传世器铜卣,铭文作“父丁。孤竹亚𠂔”^{[24]3298},这是亚𠂔族的某人为父丁所作。铭文中的“孤竹”应是邦国或地域之名,在铭文中作为族氏名的限定词,使之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同一族名。以上两个亚族均处于孤竹之地。由以上两件铜器可以看出地处孤竹的两个氏族,其先祖曾有人担任商王国的“亚”职,而且他们与地处安阳地区的商王朝贵族在制作、使用青铜礼器方面也没有什么区别,反映出这些氏族认同商的礼制并长期受商的统辖。铭文中的“孤竹”,其地大概在今渤海西北岸的河北迁安、卢龙一带。《孟子·离娄上》记“伯夷辟

纣,居北海之滨”^[41],伯夷为孤竹国君,北海即渤海。《管子·小匡》记齐桓公:“北伐山戎,制泠支,斩孤竹。”^[42]学者亦指出,在今天津、唐山一带发现的一批商周之际的铜器墓,其器物组合和每类器物的文化因素表明,当地居民使用中原的礼器来表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但在日用品和装束、葬俗方面则保留了本地的传统^[4],所代表的正是认同商的礼制、受商王国辖制的土著族邦势力。

商代后期在燕山南麓地区可能还存在着一支“亚戛”族。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北京顺义牛栏山金牛村曾征集8件青铜器,系当地村民挖房基时发现的,应是出自墓葬。铜器包括鼎、卣、尊、觶各1件,觚、爵各2件,大多带有“亚戛”铭文^[43],铭文当代表墓主的氏族名号。相关遗存中觚、爵等量配置,且食器少而酒器多,具有很明显的殷墟铜器组合的特点,反映了亚戛贵族遵循商人礼制,用青铜器来标识其地位与身份。这些以“亚”为称的族群的性质与刘家河墓葬主人相似,都应是臣服于商王朝的燕南地方族群。

结 语

据以上论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刘家河墓葬埋葬时间大致在商王国由前期向后期转进之际。墓主的族属是燕山南麓的土著族群,其本人则可能是土著族群的首领,在商王国贵族等级体系中位属中等。刘家河墓葬铜器群数量较多且具有一定的组合关系,与商文化铜礼器属同一系统,具有重要的礼制功能。这批铜器作为随葬品指示了墓主的政治身份。

其二,礼制在早期国家政治统治中发挥着基础作用,青铜礼器系统应当作为判断商周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政治统辖关系的关键指标。刘家河青铜礼器群从器物到组合均与商文化礼器系统大体一致,反映了两者共享同一礼制。刘家河墓葬中所出陨铁刃铜钺亦具有礼器性质,相似的器物又见于同一时期的其他商文化遗存,可能代表着墓主的臣属身份,商周时期

的王赐地方贵族以钺,即是对其所拥有的地方管治权的认定。刘家河墓葬所代表的人群作为活跃在燕山南麓的土著族群,虽非商人族群,却很有可能受到商王廷的政治控制,接受商王的册命与赏赐。

其三,刘家河墓葬的主人活跃于商代前期向后期转进之际,此一时期,商王国的中心都邑自郑州—洛阳一线向北越过黄河转移到今安阳地区的洹河两岸。在重新规划王畿区的同时,商王国势力向北方扩展,与太行山两侧及燕山南北的土著族群建立了密切联系,由内至外形成了面、块、点相结合的疆域经略形势。刘家河墓葬主人应即是臣属国族中的一位,与商人势力相联合,形成了一个隶属于商王国的据点。

其四,商王国通过刘家河这类据点与北方地区展开广泛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刘家河与藁城台西遗址及洹北商城处在一条线上,实际上处于北方地区与商核心区交接的中间位置,具有中转站的功能。经由这条线路,起源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技术、文化乃至人群,在商代后期持续进入包括殷墟在内的中原地区,内蒙古东南及辽西地区的铜、锡等矿料亦由此转运进入商王国的核心区。

其五,在中商以后直至殷周之际,在燕山南麓地区一直存在着一批地方族邦势力,其多以“亚”为称,例如见于青铜器铭文的“亚彭”“亚夔”“亚戛”等。这批贵族与刘家河墓主相似,行用商周青铜礼器系统,遵循中原礼制,以中原礼器来标识自己的身份与地位,显见其均是臣服于殷商王国的燕南地方势力。在商代后期,商王国在燕南地区的控制可能在范围及强度上随具体情况而有所变化,但其政治控制在大部分时间内并未缺席。这也为其后周王国在这一地区分封诸侯邦国奠定了文化、政治与经济的基础。

注释

①依次参见孟世凯:《商代“北土”方国与氏族初探》,《河北学刊》1991年第6期;刘桓:《殷周时期的北土与北方》,《殷都学刊》1998年第2期;宋新潮:《商代政治疆域与商文化影响范围》,《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宋镇豪:《商代的王畿、四土与四至》,《南方文物》1994年

第1期;卢连成:《商代社会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构与周边地区青铜文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王震中:《商代的王畿与四土》,《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张翠莲:《商文化的北界》,《考古》2016年第4期。②与刘家河墓葬大略同时且可资比较者例如安阳小屯M331,其墓室面积约6.7平方米,随葬青铜容器18件。孟宪武先生曾将刘家河墓葬所出铜器与小屯M331作过比较。参见孟宪武:《平谷商代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器对比研究》,王宇信等主编:《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在墓葬规格方面,朱凤瀚先生将墓室面积在4平方米至45平方米之间的商周墓葬划分为中型墓。参见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942页。③该方面观点参见刘绪、赵福生:《围坊三期文化的年代与刘家河M1的属性》,宿白主编:《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151页;韩嘉谷:《谈平谷刘家河青铜文化遗存》,王宇信等主编:《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206页;张翠莲:《商文化的北界》,《考古》2016年第4期;蒋刚、赵明星、李媛:《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时期墓葬遗存的再认识》,《华夏考古》2012年第3期。④参见李先登:《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发现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六),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66页;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91-392页。⑤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04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试掘简报》,石金鸣主编:《三晋考古》第3辑,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127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柳林高红遗址2007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9年第6期。⑥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北区1998年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1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邢台市葛家庄遗址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5年第2期。⑦参见何毓灵、岳洪彬:《涿北商城十年之回顾》,《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涿北商城铸铜作坊遗址2015~2019年发掘简报》,《考古》2020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 [1]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J].文物,1977(11):1-8.
- [2]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80.
- [3]杜金鹏.夏商周考古学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

- [4]杨建华.燕山南北商周之际青铜器遗存的分群研究[J].考古学报,2002(2):157-174.
- [5]杨升南.北京平谷刘家河铜器墓主身份[C]//王宇信,等.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93.
- [6]蒋刚,赵明星,李媛.京津唐地区晚商西周时期墓葬遗存的再认识[J].华夏考古,2012(3):55-61.
- [7]张渭莲,段宏振.中原与北方之间的文化走廊:太行山东麓地区先秦文化的演进格局[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 [8]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92.
- [9]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J].文物,1972(4):62-64.
- [10]李伯谦.从灵石旌介商墓的发现看晋陕高原青铜文化的归属[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15-29.
- [11]沃浩伟.晋陕高原商周时期青铜器分群研究[M]//杨建华,蒋刚.公元前2千纪的晋陕高原与燕山南北.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62.
- [12]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3062.
- [13]何炳棣.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7:163.
- [14]韩嘉谷.谈平谷刘家河青铜文化遗存[C]//王宇信,等.北京平谷与华夏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12.
- [15]蒋刚.再论陕北、晋西北南流黄河两岸出土商周青铜器[M]//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边疆考古研究:第2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135-138.
- [16]杨绍舜.山西柳林县高红发现商代铜器[J].考古,1981(3):211-212.
- [1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57,166.
- [18]沈融.一组外流中国青铜兵器评述[J].中原文物,1995(2):56-60.
- [19]张天宇,等.叶家山M111出土的商代铁援铜戈[J].江汉考古,2020(2):110-115.
- [20]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1]赵光贤.《逸周书·克殷》篇释惑[J].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4):36-39.
- [22]杨宽.论《逸周书》[J].中华文史论丛,1989(1):1-14.
- [2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5]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J].考古学报,1999(4):393-420.
- [26]张翠莲.商文化的北界[J].考古,2016(4):91-101.
- [27]中美洹河流域考古队.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J].考古,1998(10):13-22.
- [28]邢台东先贤考古队.邢台东先贤商代遗址发掘报告[M]//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古代文明: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440.
- [29]侯卫东.试析洹北商城的形成背景[J].华夏考古,2019(4):52-56.
- [30]孙亚冰,林欢.商代地理与方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54.
- [31]苏赫.从昭盟发现的大型青铜器试论北方的早期青铜文明[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2(2):108-111.
- [32]克什克腾旗文化馆.辽宁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发现商代铜甗[J].考古,1977(5):354.
- [33]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5北方民族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图版说明57.
- [34]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M]//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89.
- [35]陈小三.早商文化的北进与北方系青铜器的发展[M]//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边疆考古研究:第17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16.
- [36]李旻.夜中星陨如雨[J].读书,2021(9):32-40.
- [37]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2014(9):3-14.
- [38]王立新,付琳.论克什克腾旗喜鹊沟铜矿遗址及相关问题[J].考古,2015(4):79-87.
- [39]郭沫若.甲骨文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3:6987号.
- [40]王坤鹏.商代异族邦伯考[J].中国史研究,2018(3):5-21.
- [41]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2009:5919.
- [42]黎翔凤.管子校注[M].梁运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4:425.
- [43]程长新.北京市顺义县牛栏山出土一组周初带铭青铜器[J].文物,1983(11):64-67.

The Governance of the Shang Kingdom over Northern Earth: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Remains of Liujiahe Tomb in Pinggu, Beijing

Wang Kunpeng

Abstract: The ritual system played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early government. The bronze ritual system of Liujiahe Tomb which resemble the Shang sacrificial vessel can be used as the key evidence to judge its relationship with Shang Kingdom. The bronze Yue with an iron blade from Liujiahe's tomb was also of the nature of a ritual vessel. At that time, the king gave the local nobles Yue meant giving them the power to manage the place. The master of the tomb of Liujiahe was active at the turn of the early and late Shang dynasty. While moving the kingdom's capital, the Shang expanded northbound and established close contacts with the ethnic group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hang Mountains and Yanshan Mountains. Thus a territorial strategy combining surface, block, and point formed. The Shang Kingdom developed extensive mater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the northern regions through such strongholds as Liujiahe. In the late Shang dynasty, there had been a group of active local nobles belonging to the Shang dynasty in the southern foot of the Yanshan Mountains. The Shang Kingdom always has political control over the southern foothills of the Yanshan Mountains. This also laid the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enfeoffment of the Zhou Kingdom in this region.

Key words: Liujiahe Tomb; the Shang dynasty; north earth; territory

[责任编辑/知 然]